

● 金 凤 著
华文出版社

风起青萍末



风起青萍末

金凤 著

华文出版社

1989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万朗

封面设计：冯光美

风起青萍末

余凤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印张 12.125字数 270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册

ISBN7—5075—0048—9/G·1 定价：4.30元

序

我的记者生涯，今年正好满四十年。郭沫若同志曾称誉记者是“当代的太史公”。作为人民日报记者，有幸参加许多重大政治、社会生活的采访，记录下当代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人物。作为时代的记录和见证人，除了公开发表在报纸和一些杂志上的文章，我的采访笔记本中，竟还留有不少相当珍贵的资料。弃之可惜。近几年抽业余时间，陆续写出记者生涯中所见到过的一些值得纪念的人和事。按年代排列，已出了两本书。一是《历史的瞬间》，自1948年到1953年。二是《回声激荡》，自1954年到1958年。这一本书，写的是1959年到1966年间采访中所遇到的人和事。当然，不会是全部采访过程的记录，不过是如摄影一般，选取了一些自以为值得留下的人物镜头和社会生活场景。我不敢与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比美，他给我们留下了总称为《人间喜剧》的几十部煌煌巨著，恩格斯曾称之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录好的解剖和透视。我这支拙劣的笔，不过是将我看到和听到的当代生活，留下一点微弱的回声和反响。

滨临太平洋的中国似乎是个多风的国家。不仅沿海地区每年要刮十几场台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风浪也不小。解放前不必说了，解放后到“文革”前，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年过半百的人怕都还记忆犹新，有的甚至会刻骨铭心般留在记忆深处。尤其是那刮遍神州大地、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命”，可真是史无前例，硬是“从上而下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刮起“十二级台风”。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并非一夜之间忽然刮起。我们大致能从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听到那阵阵刮来、愈刮愈烈的风的呼啸。

这本小书写的便是那个特定时期风的呼啸的微弱回响，听起来当然不那么悦耳动听。何况时代不同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切要“向前看”，似乎不宜过多纠缠那些令人伤心、苦恼甚至不幸的过去。但愚陋的我，却以为适当地记住过去干过的一些蠢事，也许能使我们现在的事业干得更好些，少走一些弯路。听一听已经逝去的风的呼啸，应当能使我们增强一点抗击风浪的“免疫力”。1958年的“浮夸风”虽成历史，而浮夸并未根绝。在新闻领域内，失实的报道还屡见不鲜。社会生活中，“一阵风”、“一窝风”的现象也还存在。出版界不是出现过所谓“金庸热”、“琼瑶热”吗？当然，现在的所谓这种“热”、那种“风”和过去的政治风浪不可类比，也许是我们社会前进中难以避免的摇摆，不会动摇根本。

全书按年代排列，先写人物，后为纪事，便于读者了解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众生相。写人大抵只是随笔勾划一幅剪影，不是人物列传，不作全面评价。他们大多是我人生旅途中所遇的良师益友，以他们的情操和风骨，开拓、陶冶了我的视野和精神世界。也有那么几位写来笔调略有不恭。人生本是复杂的多棱镜呀！

我怀着难以抑制的思念之情，写了不幸逝世的郭小川同志和陈笑雨同志。我有幸和郭小川同志同在人民日报记者部

同事几年，和陈笑雨同志一起在北京郊区通县一个大队共同参加“四清运动”，就近观察过他们。他们是我的前辈，却毫无前辈的架子。他们都有卓越的才华，又同有耿直的品格。一个在“文革”刚刚开始，一个在“四人帮”倒台不久，便都匆匆离开我们。我十分痛惜中国文艺界失去两位卓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中国失去两位卓有贡献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当然，“文革”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又何止这两位诗人和作家。

值得一提的，还有1961年我去江西采访时见到的几位省委领导和一位县委书记。尽管1958年“大跃进”时“浮夸风”、“共产风”等狂热的风浪盛行，使老百姓吃足苦头。可贵的是，当时江西省委和一些县委同志却能在困难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奇迹般地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 and 农业生产的稳定。不到两千万人口的江西，在最困难的1960年，向中央上缴十二亿斤大米，位居全国之首。在全国粮食减产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江西却稳定增产。老俵们吃得饱肚子，只是埋怨米酒喝得少了。这真使我开阔了眼界。中国幅员辽阔，人才济济。即使一阵阵风刮得厉害，自有一些有识之士能坚决顶住风浪，巍然兀立，千方百计保护我们宝贵的国力和民力。曲折和横逆总是暂时的。江西之行使我陡增勇气和信心。我记下省委的谈话，记下“开顶风船”的县委书记，全文发表了我的“南行日记”。

纪事部分，写的是1959年到1966年我采访和经历的一些难忘的片断，披露了记者工作的艰难和困惑。我从不敢自诩为“一贯正确”的好汉，只是如实写出我那一时期思想和心情的惶惑、苦恼和不安。有几篇文章一再说到吃饭的艰难。的

确，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人在挨饿！我只是略略尝到一点挨饿的滋味，更多的是看到饥饿的众生相而难受、而痛苦。这个时代总算过去了。中国前进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落后与贫穷，但十一亿人民的生活确有改善。这是最值得庆幸的。

我深深感到作文难，作人更难。这几天晚上，随手翻阅《庄子》。中国历史上一些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阶级，每当痛苦难忍，愤世嫉俗，便不免遁入老庄哲学，借以逃避现实。庄子文笔的恢阔精妙，幻想的开阔奇丽，寓言的丰富多姿，的确引人入胜。我年轻时笃信鲁迅先生的话，很少看中国古书，怕被引到消沉的路上去。人过中年，涉世较深，偶有余暇，才又稍稍浏览一些传统的古典著作。我看《庄子》也并未逃开现实的人间世界。诸子百家中，我还是欣赏墨子的哲学。他老先生“兼爱”、“非攻”的学说以及他和弟子们“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献身精神，着实使我神往。但墨子的学说从未真正盛行，这不是没有缘故的。当然，我们不能召唤两千多年前的亡灵来拯救中国，改造世界。随着世界大工业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指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墨老庄学说的精华，我们依旧可以批判地汲取。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概采取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我是反对的。有人不加分析地虔诚膜拜西方文明，达到可笑的程度。其实，世间任何事物不可能尽善尽美。对于人类的文化遗产，科学的态度，是汲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善而从。总不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那样囫圇吞下，食而不知其味。

信笔写来，只听到远远近近，炮竹声霹雳拍拉地繁响起来了。我似乎闻到一股浓郁的火药味。中国的传统佳节，

1989年的春节即将来临。

在这岁暮更新之际，交出这一本书，也算了却一桩心事。我的记者生涯写了三本，只写到“文革”前。接下去，要写“文革”中的经历，更想写一写自己大半辈子的心路历程。人生的探索 and 追求无有穷期，对真理的认识也未有穷期。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在《反杜林论》中就无情地嘲笑过杜林企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囊括全球的最终真理的幻想。可怜的老黑格尔尽管极顶聪明，也曾这样尝试过，至终不过建立在他自己的头脑中。记得我年轻时，不是由于狂妄，而是由于幼稚，曾经简单地以为真理已经掌握在我手中，或掌握在我所崇拜的人手中。我只要遵循真理的道路，豪迈地向前走去，自然无往而不胜。几十年风风雨雨，在摔打滚摸中过来，才知道有时也许总只在真理的边缘打圈子，甚至，真理碰到鼻子底下，也还视而不见。例如，革命推翻了腐败的障碍社会前进的旧政权，就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简单的真理。然而，中国却几经曲折，排除多少干扰，近十年才开始付诸实践。有人锦衣玉食，似乎很少想到，中国至今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境地。普通人都知道，农民每一亩地要增产几十斤粮食、棉花，工人每一项产品要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消耗，科学技术人员要想在某项科技领域内有所突破，要付出多少艰苦劳动。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写起来简简单单八个字，真正做好这篇大文章，又是多么复杂和艰巨！

时近岁暮，北京已充满一派节日气氛。我知道，许许多多人都都在急急赶回家去，准备美美地吃一顿团圆饭。我那刚满五岁的小外孙，早已迫不及待地等待除夕的来临。他等着

穿新衣、戴新帽，等着点起红灯笼，更等着燃放彩色烟花和连响鞭炮的快乐。回想起来，童年时的我，也常常怀着这样急不可耐的心情等着一年一度大除夕的来临。长大了，这种过节的心情日渐淡漠。有好几年春节，我都在农村、在工厂、在水利工地上度过。节日首先属于孩子们。我这一辈人，四十年来，一直拼搏在第一线，生活十分辛苦，死亡时常提早降临。就在前几天，我刚收到清华一位老同学去世的讣告。他只活了五十九岁。我悲从中来，不知自己是否能健康地支持到2,000年。我相信，我的小外孙一定会跨过二十世纪，奔赴二十一世纪，赶上建国一百周年。那时的中国，定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林。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定会比现在更充实，更丰富。世界科技的发展，也许能使人们登上宇宙飞船，往太空深处探寻我一心向往的外星人的踪迹……

想到这里，心胸又不自觉开朗起来。我从来是个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怀有十足的信心。风的呼啸是暂时的，总会有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我在《历史的瞬间》中曾写过，地球历史四十多亿年，人类历史二、三百万年，人类文明史只有几千年。从发展远景来看，人类还处在幼年时期，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从每个人的发展来看，不过是联结过去和未来无数环中的一个。不过，有的人作用大些，有的人作用小些，有的人起了负作用。我们还在“必然的王国”中探索，远未达到“自由的王国”，只求一生中那怕缩小它们之间一点点距离。

怀着一颗人类幼年时期的“幼稚的心”，谨将这本小书献给同时代人和未来的一代。

(1989年除夕夜)

目 录

序	(1)
“你养过猪吗?”——记王震同志的一次谈话	(1)
西双版纳赞哈	(10)
刘氏三杰	(17)
江西的“奇迹”——访江西几位省委领导同志	(28)
开“顶风船”的县委书记	(44)
“当代愚公”的故事	(52)
逝去的和扑来的青春——一个普通的女人的故事	(74)
硬汉子流泪了	(104)
揭开西下营的“秘密”	(115)
吴兴春在侗乡	(124)
诗人郭小川的秋天	(143)
宁折不屈的陈笑雨	(163)
一位“灵魂工程师”的灵魂	(185)
“演员革命化”	(199)
青青的坟墓	(245)
“你敢吃河豚吗?”	(250)
下笔千斤重	(256)
“走钢丝”	(264)
空货架和高价餐厅	(273)

葱油饼和……	(280)
南行日记……	(290)
不平静的“世外桃源”……	(341)
“冻结的”花朵……	(353)
采访历险记……	(366)
“炮弹愈打愈近了！”……	(377)

“你养过猪吗？”

——记王震同志的一次谈话

1959年冬天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赶写一篇短文。人民日报农村部负责人田流同志走进办公室。他对我说：

“你认识王震同志吗？刚刚总编室来电话，王震同志要你下午去看看他。”

我奇怪起来了。虽然，我早就听说过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我并没有见过他呀。他找我有什么事呢？

田流同志说：

“他现在是农垦部长。也许，他对农垦方面的宣传报道，有一些意见和想法。你去听听吧。”

我摇摇头，立即说：

“要谈宣传报道，应当请报社的负责同志去。我这个普通编辑，去谈什么呀？”

田流同志笑笑说：

“你去了就知道了。下午三点，到农垦部部长办公室去见他。你还是到总编室去开封介绍信吧。这篇短文，上午能赶出来吗？”

我点点头，埋头写稿了。将短文交给田流同志，又去总编室开了介绍信，已到中午。我一边吃饭，一边寻思，王震同志找我谈什么呢？不过，有机会见见这位有名的将军，我还

是挺高兴的。

下午三点，我准时到了王震同志的办公室。

我原以为，这位威镇敌胆的红军著名将领，一定长得威武雄壮。一见面，却原来是一位精瘦而又文静的老同志。他那出名的大胡子不见了，脸颊剃得光光的，穿了一身普普通通的棉制服。

我把介绍信交给他。他笑容满面地站起来和我握手，亲切地让我坐在沙发里，又给我倒了一杯茶。他自己依然坐在办公桌后的一张藤椅里。

他看完介绍信，笑呵呵地说：

“久闻大名了，你不是写过刘帅的访问记吗？不简单，你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吧？今年多大了？是哪个洋学堂里出来的？”

我们的老同志就有这样的本领，一见面，就能打消你的紧张和拘束感，使你感到如亲人般的温暖和亲切。我笑着——一回答了王震同志，一面还在想，他找我来，究竟为了什么事呢？

只听王震同志话题一转，问道：

“这一两个月内，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养猪方面的十多篇评论。听说都是你写的，是吗？”

我点点头。只见他从桌上的公文夹内，抽出十几份材料。我一看，原来都是这些评论的剪报资料。他随手翻看着这些剪报，突然问道：

“金凤同志，你养过猪吗？”

这个问题，突如其来，像闪电似地，使我心里格登一下，慌乱起来。我只得老老实实回答：

“没有养过”。

“那末，你系统地调查过人家怎么养猪吗？譬如，你有没有到公社或国营农场的养猪场蹲过点，对发展养猪事业作过周密详尽的调查？”

我仍然只能窘迫地摇摇头。

王震同志那慈祥的面容陡然变得严厉起来，那双尖锐的眼神盯住我，看了好长时间，猛然站起来，推开椅子，站到我面前，双手叉到腰间。一刹时，在我面前，一位彬彬有礼的部长变成了威风凛凛的将军。他发怒了，像是马上要训斥我。

我连忙惶恐地站了起来，像个小学生似地，准备接受老师的训教。

他一见我站起来，又看到我那惶恐的模样，尖锐的眼神变得柔和了。大概，他想到我毕竟是一位客人，不是他直接统率的部下。

他伸出手来，有礼貌地让我坐下。自己却在宽大的办公室中，走来走去。部长办公室内照例铺着厚软的地毯，他那双布底棉鞋在地毯上走着，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但我的眼光随着他的脚步移动着。我想，他是在竭力平息胸中的怒火。他为什么发火？他虽没有开口，我心中已猜到几分。他一定是因为我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里，却洋洋洒洒，写了这些评论而生气了。

果然，他又坐到办公桌后的藤椅中去了。他那一阵眼看就要爆发的怒火，好像终于被他自己强硬地克制住了。他语调温和地问：

“你没有养过猪，你在报社农村部工作，总下过乡吧？你知道老百姓养一头猪，一年要吃多少粮食？”

我结结巴巴地说：

“大概，至少总得一百多斤吧。”

“那末，你为什么在社论中这样写，‘养猪不一定要精饲料，甚至完全不要精饲料也能养猪’。还说什么‘猪吃百样草，就看你找不找’；‘只要有大量的青粗饲料，就能高速度地发展养猪事业’。你作过调查吗？大概就是从各地的剪报材料或一些干部不负责任地写的报告中抄来的吧。我虽然没有亲自养过猪，我到农场养猪场作过调查。一斤肉，两斤粮。这是最低的比例。小猪要吃粮，育肥时更要喂粮食。只有架子猪可以大量喂青粗饲料，那也要搭点粮食，不能全吃百样草。一头够出口标准、毛重二百斤的肥猪，至少须喂四百斤粮食。你说的老百姓喂的猪，吃一百多斤粮食，那是低标准了。也许，一头猪还长不到一百斤咧。往上报就算是肥猪了。人哄猪，猪哄人。它是牲口，不会说话，但它是一头活着的牲口，张嘴要吃粮食，它才能把它的肉贡献给你。我们是人，人是万物之灵。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人不吃粮食或副食，能维持生命吗？听说现在粮食紧张，不少地方已提出‘瓜菜代’了。瓜菜是可以代替一部分粮食。但要全吃瓜菜，人非得浮肿病不可。我们长征时是挨过饿的，连皮带也煮来吃了。可是，过雪山草地时，每个战士干粮袋中，还是装着一些炒米、炒面。光凭啃树皮草根，只怕跨不过雪山，也走不出草地。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每人一天还发四两黑豆哩。那仅仅能维持人最低的营养了。猪也是一样，你不喂它粮食，它就得饿死。喂很少很少一点粮食，它就长不起来，养一年还只有几十斤重，我们叫它‘僵猪’。那不叫肥猪，出不了肉，成不了材。连它造的粪，下田都没有什么肥料的劲。我们发展养猪是为了

什么呢？不是像你写的社论上所写的那样，一是为了供应人们肉食，二是为了当肥料用吗？当然，猪鬃、猪肠衣还可出口，猪皮还可制革。但首先是为了吃它的肉和当农家肥料。一头猪养了一年，只有几十斤重。既不能吃肉，又不能当好肥料。这样的猪养了有啥子用呢？”

王震同志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我默默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他看到了，笑着说：

“唉，我又不是开记者招待会，你记这些干啥子么？我不过是找你来随便聊聊罢了。我是说，干啥工作都要讲个实事求是，不可哗众取宠。主席那封关于迅速发展养猪事业的信，我也看到了。主席那封信发得很及时，今年农业生产的形势不大妙。各地粮食已出现紧张的势头。粮食一紧张，猪的数字势必要掉下来。人总得先让自己吃饱肚皮，才有余粮喂猪呀。但猪的数字下降过多，一是明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定会紧张，二是农田肥料一定会大大减少。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主席及时提出，要求各地干部注意，在安排好农民口粮的同时，尽量注意发展养猪事业。这是未雨绸缪，有科学的预见性。因此，我以为，你们报社首先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大抓粮食生产方面。粮食上去了，猪也自然会上去了。不知你以为如何？”

我连连点头称是，又小声说：

“各地报的去年（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是七千五百亿斤。原来以为粮食基本过关了。有的地方如河北徐水县甚至还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呢？听说赫鲁晓夫今年来参加我们国庆十周年，主席还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哩。”

王震同志怔了一下，挥挥手说：

“我不知道这回事。也许，你们记者的消息特别灵通。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国营农场的情况我清楚。农场附近公社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我看到的情况是，不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而是粮食少了怎么办？”

他沉重地叹了口气：

“这个该死的浮夸风啊，至今也没有完全肃清。七千五百亿斤，鬼才知道这数字怎么来的？不就是各省报的吗？报的还要多，报了一万五千亿斤！主席给压了一半。我看，还不实在。这，我管不了。还是说说养猪吧。你们报上登的，给猪耳朵打针，就能催肥。有科学根据吗？”

“我们报社确实发过这消息，但那是夜班编发的，我不很清楚”，我老老实实回答。

“不清楚，不清楚”，王震同志好像又发火了：

“你们不是在一个报社吗？不是在一个农村部工作吗？怎么叫不清楚？打针能育肥、催肥，真是天下奇谈。干脆不要粮食，我们都去打针好了。这样的报道欺世炫名，祸国殃民，真是害人非浅！还有那个让母猪热配、重配、连续配的消息，说一头母猪一年能生六十二头小猪，也是天下奇闻。那不是活活糟蹋猪吗？有没有六十二头，很难说。即使能生出来，怕也像小老鼠一般，只有几两重吧。”

“这个消息我也看过，我也不相信，曾打电话问过夜班编辑。他们回答说，问过发消息的记者，六十二头小猪是确有其事，但大部分小猪生下来就死了，每个小猪的确只有几两重。”

王震同志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厉声问道：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发这样的消息？这不纯粹是骗人吗？”